

谈《石渠宝笈·续编》中的“宋拓”《锺王楷帖》

On the So-called Song Dynasty Rubbings of the *Manuscript Written by Zhong Yao and Wang Xizhi in Regular Script in the Sequel to The Precious Collection of the Stone Moat*

尹一梅

Yin Yimei

故宫博物院
The Palace Museum

Journal of Gugong Studies 2023 Vol.24

故宫学刊

二〇二三年 第二十四辑

故宫出版社 | The Forbidden City Publishing House

谈《石渠宝笈·续编》中的“宋拓”《锺王楷帖》

On the So-called Song Dynasty Rubbings of the *Manuscript Written by Zhong Yao and Wang Xizhi in Regular Script* in the *Sequel to The Precious Collection of the Stone Moat*

尹一梅

Yin Yimei

内容提要：

《石渠宝笈·初编》中未收录碑帖拓本，为补其不足，《续编》专设“法帖一门”将拓本增入。现故宫博物院还保存有当初书籍中所记载者，特拣一册原名“宋拓”《锺王楷帖》分析考证，考递藏经历、辨拓本年代、探《续编》辑录者专擅，辨别真贋，去伪存真，纠正误识。

关键词：

拼凑伪造 时代误判 明拓与宋拓合装

ABSTRACT:

Rubbings of steles and manuscript had not been included in the Qing imperial catalog *The Precious Collection of the Stone Moat (Shiqu Baoji)* until the publication of its sequel as an independent category. Some of the works included in the sequel are still in the collection of the Palace Museum, one of which is titled the *The Song-Dynasty Rubbings of the Manuscript written by Zhong Yao and Wang Xizhi in Regular Script*. The essay is dedicated to the research on its provenance and date, as well as the professional specialties of the compilers. The author also examines evidence and offers methods to determine authenticity and detect forgeries in order to correct existing misunderstandings.

KEYWORDS:

Forgery, false identification of dates, Combined binding of Ming-dynasty rubbings and Song Dynasty rubbings

明代中期以后，大批的内府藏品流落于世，这促使并成就了不少明末清初的收藏大家。由于世道变迁，或是作为权力阶层，或是有钱财资本之人，手里聚集了许多高品质藏品。而后的清统治阶段，特别是乾隆时期，皇家极力从民间搜集这些珍贵藏品，使大量的书画类艺术品集中于宫廷。乾隆帝喜好书画，君臣共同品评赏鉴，作书论画。书画藏品、作品日益增多，也促就了《石渠宝笈》的诞生。

《秘殿珠林》于乾隆八年（1743）十二月开始编纂，乾隆九年（1744）五月成书，专载清内府所藏释道题材的书画和石刻、木刻、织绣等艺术品。当时乾隆帝谕旨“着张照、梁诗正、励宗万、张若霭编集中土琳琅，章嘉胡士克图阅认西天贝叶”¹，其后的《石渠宝笈》则在《凡例》后有张照、梁诗正、励宗万、张若霭、庄有恭、裘曰修、陈邦彦、观保、董邦达等臣工之名，人员有了增加和变化。《石渠宝笈》著录内府所藏释道题材之外的历朝书画等，始编于乾隆九年二月，成书于乾隆十年（1745）十月。两书之后又各有《续编》《三编》（以下简称《初编》《续编》《三编》），《续编》由王杰、董诰、彭元瑞、金士松、沈初、玉保、瑚图礼、吴省兰、阮元、那彦成等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正月奉敕编纂，五十八年（1793）长至成书，收录了《初编》未载的历朝书画、法帖、缙丝、石刻图像及臣工新献的作品等。《三编》于嘉庆二十年（1815）二月，由英和、黄钺、姚文田、吴其彦、张鳞、顾皋、朱方增、吴信中、龙汝言、沈维鏞、胡敬等奉敕编纂，嘉庆二十一年（1816）闰六月成书。

碑帖拓本类在《初编》中并未载录，为补不足，从《续编》开始增入拓本，《续编·凡例》清楚地叙述了编辑者的理念与意图。《续编》共载录碑帖拓本五十三条，《三编》则收录四十七条²。

《石渠宝笈》著录的碑帖拓本，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清宫收藏的，系当时认定的善本、精品，这些藏品来源有明宫旧朝接收、官员敬献、收购、罚没等；二是清宫镌刻的皇帝御书作品或是救命御制者。清内府旧藏书画也曾大量流散，原因有皇帝赏赐、外国侵略者掠夺、溥仪携带出宫及太监偷盗等。这些出宫的拓本，1949年以后有再次回到故宫的，成为国家的珍贵藏品，俗称“二进宫”者。本文遴选一种《续编》著录的“宋拓”《锺王楷帖》，是进宫之后再未外出的清宫旧藏。通过其特征剖析根本，并以此本为切入点探讨分析《续编》中著录失误及鉴定错误的原因。

一 “宋拓”《锺王楷帖》

“宋拓”《锺王楷帖》，曾贮藏懋勤殿。拓本锦面，墨色精黑，白纸挖镶剪方裱。墨纸十九开，半开尺寸纵24.4至25.2厘米，横12.6至13.3厘米不等。锦面粘贴纸签，帖内夹黄色签条一张，楷书“宋拓锺王楷帖，一册上等”。首开钤印“乾隆御览之宝”（椭圆印）、“懋勤殿鉴定章”，末开有“乾隆御览之宝”（椭圆印）。内中集七种小楷刻拓，《宣示表》、《戎路表》、《力命表》、《荐季



图1 “宋拓”《锺王楷帖》封面

1 《秘殿珠林石渠宝笈合编·一》，上海书店影印出版，1988年，《秘殿珠林》第1页。

2 另见《三编》中还记录两件拓本，在《授受礼成申示撰进颂册诸臣谕》后记“又墨拓一册”，藏于安佑宫；《元赵孟頫摹定武兰亭》（一卷）“前装墨拓《兰亭序》一卷”，贮养心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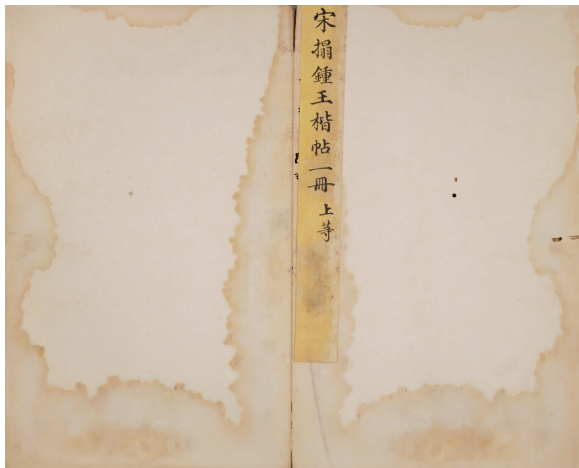


图2 前附页及黄签条

直表》(以下简称“四表”)、《曹娥碑》及二种《黄庭经》¹。〔图1、图2〕

(一) 墨拓部分

《宣示表》，是锺繇著名的小楷法帖。锺繇(151—230)字元常，是汉末至三国曹魏时著名书法家、政治家，魏国重臣。拜御史中丞，封东武亭侯，明帝时封定陵侯，迁太傅，人称锺太傅。太和四年(230)去世，谥号“成”。锺繇擅书，各体兼备，被后世尊为“正书之祖”。他的书法对后世影响深远，与东晋书法家王羲之并称为“锺王”。南朝庾肩吾将锺繇的书法列为“上之上”，唐张怀瓘在《书断》中将其书法列在“神品”内。《宣示表》是锺繇写给魏文帝曹丕的一份奏文，内容是希望曹丕接受孙权归附的请求，语气谨慎谦恭，字体宽博工整，点画遒劲朴茂。此书真迹未存，只刻本传世，多称据王羲之临本摹刻，存十八行，其实皆后人临摹本。宋《淳化阁帖》《大观帖》，明《东书堂集古法帖》等丛帖中有刊刻，归在锺繇名下。除丛帖外，单刻帖较多，传世宋刻有残本及完本，帖石存世者有南宋贾似道摹刻版，现藏首都博物馆。此拓本特点是后部镌刻宋徽宗双龙圆玺及“政和”连珠印，字口肥润，墨色深浓，偶有洇墨、涂墨现象。小楷刻帖，流传版本较多，与《兰亭序》一样难以分辨承继关系。见两种版本，在行字安排上不同，如“也”字，一种置十行末，一种在十一行首，此本为后一种。〔图3〕

《戎路表》又名《贺捷表》，东汉建安二十四年(219)锺繇六十八岁时书。内容为锺繇得知蜀将关羽



图3 《宣示表》

1 《宣示表》《戎路表》《力命表》《荐季直表》，皆传为魏锺繇书。《曹娥碑》《黄庭经》传系王羲之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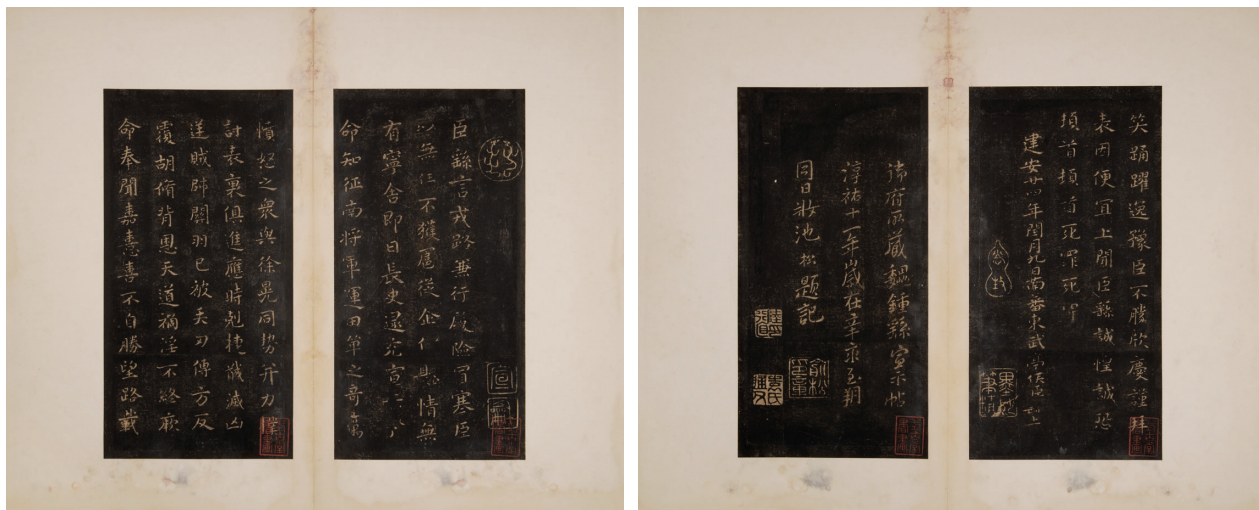


图4 《戎路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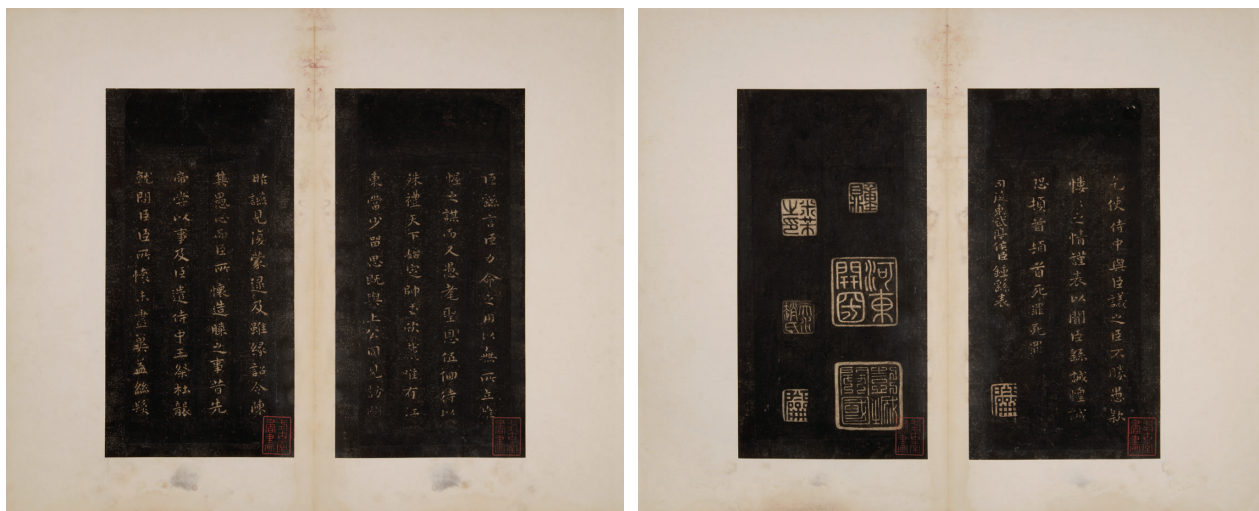


图5 《力命表》

中箭的消息后给曹操写的贺捷奏表，书法楷中略带隶意，显古雅之趣，曾刻入明代《郁冈斋墨妙》《玉烟堂帖》等丛帖。表前部刻宋徽宗双龙玺及“宣和”连珠印，后刻贾似道“悦生”葫芦印及“墨妙笔精”印。下接俞松刻跋三行：“御府所藏魏锺繇《宣示帖》，淳祐十一年（1251）岁在辛亥至朔同日妆池。松题记。”〔图4〕

《力命表》，为锺繇楷书名篇，其文言及自己虽已老迈，但能继续为国效力，是向魏帝倾诉衷肠的表奏。明《浚墨斋帖》《快雪堂帖》等丛帖收刻，在《浚墨斋帖》中归在锺繇名下，《快雪堂帖》归于王羲之临本。此书多为八行版本，是本刻成十二行，共一百四十七字。后部半开墨纸上有“重鼎”“河东开国”“彭城开国”“米芾之印”“天水赵氏”“鬲”等刻印。〔图5〕

《荐季直表》，是锺繇向文帝曹丕推荐旧臣季直的奏表。此作写于魏黄初二年（221），锺繇时年七十。季直在建立曹魏政权时有功绩，罢官后生活困难。锺繇表中言其身体尚健，望念旧勋，给予官职，继续效力，使之摆脱困境。是表小楷十九行，据记载宋时刻入《戏鱼堂帖》等，明代的《真赏斋帖》《郁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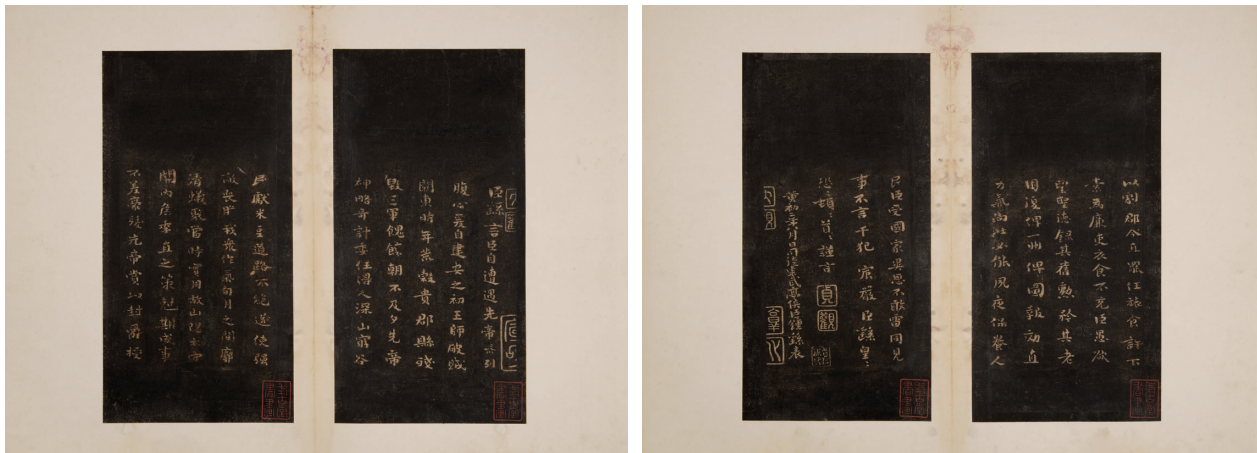


图6 《荐季直表》



图7-1 《曹娥碑》



图7-2 《曹娥碑》



图7-3 《曹娥碑》后刻款

斋墨妙》《玉烟堂帖》等收刻，清代内府著名刻帖《三希堂法帖》镌其于卷首，此外尚有不少单刻帖传世。拓本墨色黝黑，字口清晰。刻印有“大观”（连珠半印）、“宣和”（半印）、“贞观”（连珠印）、“贾似道印”、“淳化”（连珠半印）。〔图6〕以上“四表”鉴藏印除乾隆御览之宝“懋勤殿鉴定章”外，只有卞永誉在每页右下角钐盖的“式古堂书画”。

《曹娥碑》，相传王羲之书，为著名晋唐小楷之一。内容是记载曹娥投江寻父的孝行，颂扬她的美德。此小楷宋《宝晋斋帖》、明《停云馆帖》等丛帖收刻，单帖亦多。传世拓本有肥、瘦二本，此拓内有数字缺刻或残刻，如二行缺“虞”“同”等字，末刻“升平二年（358）八月十五日记之”，是肥字本的一种。文后刻观款（按帖上顺序从右向左排列）：“元和十年（815）十月二日观，冯审字退思（下有残‘僧’字）”，“会昌六年（846）三月廿八日翰林学士□琮、将仕郎李□隐同观”，“吏龙门县令王仲伦借观”，“大历二年（767）岁次己未二月辛未朔三日癸酉，百姓唐尚客奉县令韩□处分命题”，“参军刘钧题此世之罕物”，“著作佐郎国子博士韩愈、赵玄遇、樊宗师、处士卢同观，元和四年（809）五月二十日退之题”。其中有年号的观款是大历、元和、会昌，大历（766—779）是唐代宗李豫的年号，元和（806—820）是唐宪宗李纯的年号，会昌（841—846）是唐武宗李炎年号。拓本镌刻精良，鉴藏印除每页有卞永誉“式古堂书画”印外，还有“古杭瑞南高氏藏画记”“大师维垣”印各两方。〔图7-1~图7-3〕

《黄庭经》（第一种），此小楷帖传为王羲之书，六十行，行字二十至二十二不等。《黄庭经》刻本较多，丛帖中明代《东书堂帖》《停云馆帖》《余清斋法帖》《泼墨斋帖》等刻入，单刻帖特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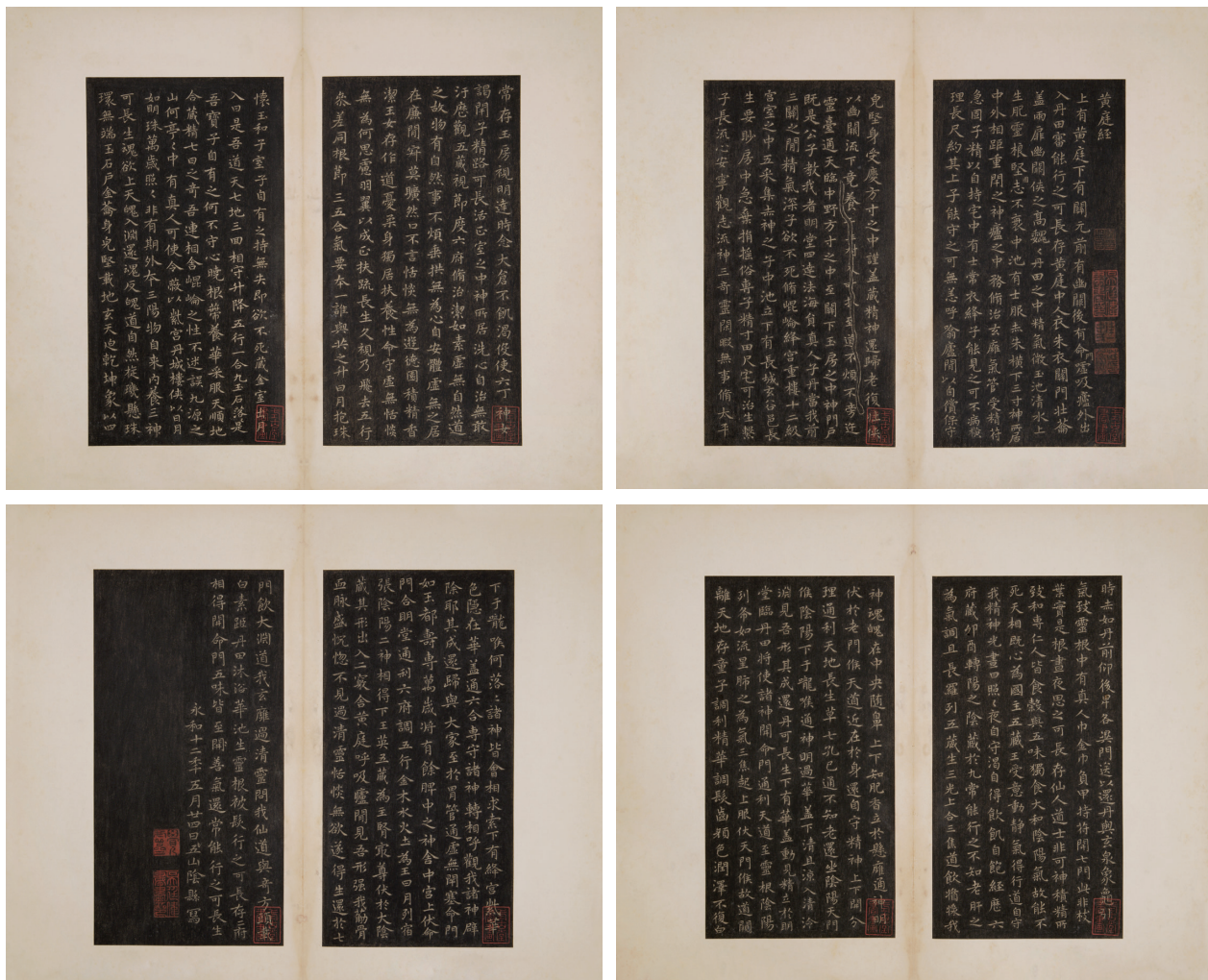


图8 《黄庭经》（第一种）

各具。拓本刻拓精湛，第十行“养”字以下共九字原底本被虫蚀（人称“水痕本”）；十五行“摇俗”未被刻成“淫欲”；第十六行为“修太平”，非“心太平”（因此有“修太平本”之称）；四十五行“渊”字避唐讳缺末笔；五十四行“王英”之“王”字旁边无点笔。鉴藏印除卞永誉外，有“管世昌印”（依据《续编》）、“吴廷伟书画印”、“觉虚斋”及两方模糊辨识不全印¹。〔图8〕

《黄庭经》（第二种），亦为“水痕本”，但与前一本不同版（“王英”之“王”字旁有点笔）。经首刻印“大观”连珠半印及“淳化”连珠印，后有虞世南刻跋：“王内史草隶为古今标帜，乃《楔帖》与《乐毅论》《黄庭经》尤世所珍赏。人获只字若珙璧，况全墨哉。余值弘文，上每诏书《列女传》，顾未得羲之真迹，为楷是陶者无形也。偶阅秘府的《黄庭》此卷，其笔力神妙，具备诸法，殆天授者与，焉能仿佛其万一。银青光禄伯施虞世南敬观”。传世《黄庭经》有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临本称，有谓此为虞世南临本，字体遒劲瘦

¹ 《石渠宝笈·续编》中释为“□一中氏”“汪□□印”。



图9-1 《黄庭经》(第二种)



图9-2 《黄庭经》(第二种)



图9-3 《黄庭经》(第二种)



图9-4 《黄庭经》(第二种)



图9-5 虞世南刻跋及沈荃书跋

峻,为宋时单刻帖佳本。是拓鉴藏印:“沈荃私印”“式古堂书画”“令之清玩”“令之仙客”“乾隆御览之宝”。〔图9-1~图9-5〕

此《锺王楷帖》拓本上共有清宫玺印两种,其他鉴藏印记十七种。

(二) 题跋部分

拓本有墨笔跋文两段。曹溶一跋在“四表”后:“顺治二年(1645)庙市得此本古迹不可见,见之有典刑之思。锄菜翁。”〔图10〕曹溶(1613—1685),字洁躬,号秋岳、倦圃、锄菜翁等,浙江秀水(今嘉兴)人。崇祯十年(1637)进士,官御史,入清后任顺天学政、户部右侍郎、广东布政使、山西按察副使等。具文名,诗词声誉高。富藏书,精鉴别,尤工尺牍。《广东通志》记其洁己爱民,一介不取,书囊之外,别无长

物。著述颇丰,有《续献徵录》《静惕堂诗文》《学海类编》《金石表》等。

沈荃一跋在拓本尾部:“右军楷书,推此经为冠,顾翻刻纷纭。劣者固不足论,即有佳本,搃不出《停云》面目耳。是册纸墨黝古,丰采焕发。后有虞伯施跋,乃世所罕见者。其为宋拓无疑,宝之宝之。丁未中秋后四日,过也园漫书。沈荃。”沈荃(1624—1684),字贞蕤,号绎堂,又号充斋,华亭(今上海松江)人。顺治九年(1652)探花,授编修,康熙年间擢国子监祭酒,詹事府詹事,加礼部侍郎,卒谥文恪。学行淳洁,以书名海内,系康熙年间重要书家,受康



图10 曹溶跋文

熙帝特达之遇，著有《充斋集》。

二 考证鉴定

小楷刻帖，正如张彦生先生所说：“王羲之真迹，难取可信证据，魏锺书更是难考。小楷书但问书体佳否，不能深究真伪。”¹以下从墨拓和题跋两部分来考证七篇小楷的拓制时间及拓本递藏情况。

（一）墨拓考证

《宣示表》《戎路表》：所见二表往往连刻，《贺捷表》后有俞松刻跋²。此册拓本原定为“宋拓”，但俞松是南宋人，刻跋文字的时间在淳祐十一年，已是南宋晚期，刻帖完成必然更晚。特别是其后还有“陆行直印”“袁氏通父”刻印。袁易（1262—1306），字通甫，平江长洲（今江苏苏州）人。文学家、词人。少敏于学，年少英发，不乐仕进，归隐松江之滨。筑堂“静春”，有书万卷，尽自为校定。黄潛《故静春先生袁君墓志铭并序》云：“君丰姿秀朗，每风止雨收，挟小舟，以笔床、茶灶、古玩器自随，逍遥容与，扣舷而歌，望之者识其为世外人。”³陆行直（1275—1349年以后），字季道，号壶天，吴江（今江苏吴江）人。善书，工诗词，精绘事，好收藏，有画作《碧梧苍石图》传世。锺繇的《荐季直表》墨迹曾两度为陆行直收藏，后入清宫，也收录于《续编》。在《续编》的“魏锺繇荐季直表真迹”条内，最后有辑录书籍者按语，其中有对观题者的介绍：“是迹至宋而始传，有薛绍彭、米芾、贾似道诸印。至元而大显，有陆行直诸人跋。至明而李应楨极力表彰，华夏以刻入《真赏斋帖》，王世贞加以考证，遂为书家最初烜赫真品矣。卷中刘岑，字季高，吴兴人，宋徽猷阁待制。陈经，字正甫，安福人，庆元中进士。陆行直，字季衡，吴江人，洪武中翰林典籍。……诸跋皆其在元时所作也。……”⁴此按语，对陆行直的介绍有问题。《荐季直表》后有陆氏跋文：“右汉锺繇《荐季直表》真迹，高古纯朴，超妙入神，无晋唐插花美女之态。上有河东薛绍彭印章，真无上太古法书，为天下第一。余于至元甲午（1294），以厚资购得于方外友存此山，后因漂泊散失，经廿六年不知所存。忽于至正九年（1349）六月一日复得之，恍然如隔世事。以得失岁月考之，历五十六载，嗟人生之几何，遇合有如此者。后之子孙，宜保藏之。吴郡陆行直题于壶中，时年七十有五。”⁵此跋有两次得到《荐季直表》的时间，如果跋文书于第二次得到墨迹的至正九年，向前推算，其生于南宋恭宗赵焬德祐元年（1275），但他的逝年沦失，渺不可考。《续编》按语言陆行直明洪武时历官翰林典籍，可即便是洪武元年（1368）任此官职，距书跋时又过去十九年，已是九十四岁高龄，可能性很小。对于陆行直任翰林典籍之职的时间有不同记载，民国间陈去病《词旨叙》记为元大德中，明弘治《吴江志》等作洪武中，《续

1 张彦生：《善本碑帖录》，中华书局，1984年，第199页。

2 （明）汪珂玉《珊瑚网》“魏太傅锺繇戎路宣示帖真迹”条内，也录有俞松此跋。汪氏言此真迹为项元汴所藏，《宣示帖》有两种，“遂昌郑元佑以‘戎路’作‘戎谿’，世遂名《戎谿帖》耳”。见（清）倪涛撰：《六艺之一录》卷一六四，法帖论述三十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3 黄潛《故静春先生袁君墓志铭并序》，见（元）袁易撰：《静春堂诗集》前，清乾隆三十七年至道光三年长塘鲍氏刻知不足斋丛书本（录自爱如生中国基本古籍库电子版图书）。

4 《秘殿珠林石渠宝笈合编·六》，《石渠宝笈续编·四》上海书店影印出版，1988年，第3148页。

5 《荐季直表》刻入《真赏斋帖》，此陆行直跋，录自故宫藏《真赏斋帖》。



图11 明拓火前本《真赏斋帖》

编》应是依据《吴江志》等说，但未详思年岁。文献记载纷乱，主要还有陆行直又字季衡，还是季衡为其第九子的问题。错误的著录，使陆行直的任官年代后延进入了明。

由于袁易与陆行直主要生存、活动时间在元代，如拓本上有二人刻印，就肯定不是宋代拓本。虽然这两方刻印与前边的纸张并不连续，系裁割粘贴的，但细观二表和俞松刻跋与陆、袁二印纸张墨色一致，皆为同时所拓。这是装裱时为使拓本紧凑，将两方元人印章移动至此正好成为一页而已。

《力命表》：帖后的刻印与明代《真赏斋帖》基本相同，区别在于印章的位置不同。《真赏斋帖》将这几方印镌在《荐季直表》上，“陆行直印”“袁氏通父”二

印，刻在前部。

《荐季直表》：此表与《真赏斋帖》¹字迹相像，损坏处亦类似。前部“大观”“宣和”及后部“贞观”“大观”“淳化”“贾似道印”等刻印位置相同。区别在于是帖前无标目，没有界框，并缺刻“陆行直印”“袁氏通父”“米芾之印”“彭城开国”“河东开国”“重鼎”“悦生”“天水赵氏”等印。〔图11〕

统观上述“四表”，拓本镌刻尚精，墨色纸张亦为同时，但不是宋拓。首先从内容看，刻印有明显漏洞：①有元人袁易与陆行直的刻印。②多方刻印与《真赏斋帖》类似，却未及《真赏斋帖》精湛，很可能是依其镌刻但改变了印章位置²。③《力命表》后的“闕”字印，是南宋楼钥之印。通常半印的形成，是原有一半钤盖在裱边上（或骑缝章），由于重裱等原因只剩半印。存留下来的半印，钤盖在前部的会存左半，后部的会存右半。刻帖常有移动印章位置的情况，《力命表》后部的两方“闕”字印，皆缺少右半一小部分，不仅位置不合理，且边缘歪斜，留下了翻刻乱造的痕迹。另外，纸墨亦无宋本气息。此“四表”上的鉴藏印，除卞氏“式古堂书画”及宫廷印玺外，再无其他。综上所述，这是卞永誉同时期得到的一组拓本。基于其与《真赏斋帖》不少刻印相同，而水平悬殊，同时又未见别本与之相像，经与故宫多本明拓小楷帖比对后，断定“四表”镌刻时间晚于《真赏斋帖》。《真赏斋帖》刻于嘉靖元年（1522），已在明代中期，“四表”刻制时间在后，也不是初拓，应该是明代中期以后的拓本。

《曹娥碑》：后面镌刻的几行观款文字，在原石上是与碑文连刻的，这有相同版本可以证明。故宫藏明拓《晋唐小楷十三种册》中的一拓，即与此同版。但从观款第三行起，《晋唐小楷十三种册》接换了另一种

1 《真赏斋帖》，无锡华夏辑家藏真迹成帖，由著名刻手张简甫操刀镌刻，刊之极精，为世人称颂。帖刻于嘉靖元年（1522），分上、中、下卷，其中《荐季直表》镌于首位。《荐季直表》墨迹元代为陆行直购藏，明代曾进华夏真赏斋，清初入内府，后历经英兵抢劫、被盗窃灭，不复存世。

2 陆行直与袁易的刻印在《真赏斋帖》中镌于《荐季直表》前，此本移接在俞松跋后，同时将“重鼎”“河东开国”“彭城开国”“米芾之印”“天水赵氏”“闕”几印刻在一起，裱在《力命表》之后。

拓本，并多出了第四、五、六行的“癸酉岁九月六……”“成四年七月十九刺史杨汉公已”“……九月……”等文字，这与明代《停云馆帖》中类似，但不同版。

此《曹娥碑》上有鉴藏印“古杭瑞南高氏藏画记”，高氏即高濂，字深甫，号瑞南，钱塘（今浙江杭州）人。生卒年不详，主要活动时间在明万历年间。他是明代著名戏曲作家、养生学家、古籍鉴赏家。曾在京任鸿胪寺官，能诗文，有《雅尚斋诗草》。著《玉簪记》脍炙南北。喜藏书，能鉴别，“妙赏楼”为藏书所。著有《遵生八笺》，其中不少鉴赏收藏知识，涉及青铜、瓷器、玉器、印玺、书画等多方面内容。书中揭示作伪之术，言宋版书作伪，甚为细致深刻。是拓《曹娥碑》曾经高濂收藏，从帖石有损坏看出不是初拓，但从字迹镌刻、纸墨色泽、高濂的收藏时间看，可定为宋代拓本。

《黄庭经》（第一种）：是拓系“修太平本”。刻拓精湛，宋刻古本特征俱在。此经鉴藏印迹除卞永誉外，清晰的有“吴廷伟书画印”“觉虚斋”，另一印可识为“管世昌印”（依据《续编》）。

吴廷伟（1676—？），字端人，扬州高邮人。康熙年间，任陕西同州知州时随清军进西藏督粮，喜诗词歌赋，著有记载西藏山川风貌、人情风俗及清军驱逐当地反叛武装的历史事件之书《定藏纪程》¹。管世昌，《娄县志》载：“管世昌，字宏道，枫泾人，真、草、隶、篆皆工。子唯木，乾隆十五年（1750）举人，任广东遂溪知县。”²

从此拓《黄庭经》可辨识印记看，康熙至乾隆年间吴廷伟、管世昌曾经收藏。

《黄庭经》（第二种）：字迹清晰，虽显瘦硬，然古意不减。宋纸帘纹清晰可见，确为宋拓无疑。故宫皮藏一本清拓《黄庭经贾刻本》，张廷济旧藏，此即民国初年从杭州出土的“贾似道本”帖版拓出者³。两相比较，帖内文字特征相类，后部亦有虞世南刻跋，应是所依同源，但不为一版。两本区别也表现于刻印，此拓“大观”及“淳化”刻印裱在前部，《贾刻本》则在陶谷草书刻跋之后。是本刻印作伪，前部的“大观”半印具有置于尾部印的特征；“淳化”印，是拼凑伪造成全印的。

《黄庭经》刻本所传多是唐宋人临本，上述二拓不是一版，但皆为宋拓古本。

（二）题跋、钤印考证

曹溶跋在“四表”后，书于顺治二年。跋文没有针对“四表”的具体评论，从语气分析，“此本古迹不可见，见之有典刑之思”是谈“四表”书法。据跋，可知曹溶三十二岁时，从一庙市购得，但地点未明。据其历官时间，是在任顺天学政时购买。曹溶收藏过“四表”，在他所撰《金石表》中也有记载⁴。此表是他历经五年搜集的八百余本碑帖目录，在“上古秦汉魏晋六朝”一节中，记有“魏锺繇四表”，并注“旧拓”，应即此次购买之本。他未将“四表”定为宋拓本，反映了其知识储备和鉴定能力。

沈荃的跋是康熙六年（1667）四十三岁时书。跋文内容与《黄庭经》对应，是沈荃观帖后写的评述。

¹ 王自立：《为官入藏留佳作——清代扬州人吴廷伟与〈定藏纪程〉》，《扬州文化研究论丛》，广陵书社，2009年第1期，第149页。

² （清）谢庭熏修，陆锡熊纂：《娄县志》卷二十七《艺术传》，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刊本，第13页。

³ 故宫藏《黄庭经贾刻本》，张廷济曾藏，帖后张氏跋文言此版为虞世南临本。

⁴ 《金石表》是曹溶所搜集拓本的目录，目下简洁注文，除名称外有书者、撰者、书体、刻石地点、刻立年代等，有的还注为“翻刻”。收录的碑、帖、墓志、经幢、题名等，虽有时代分章，内中却早晚时间混排且无分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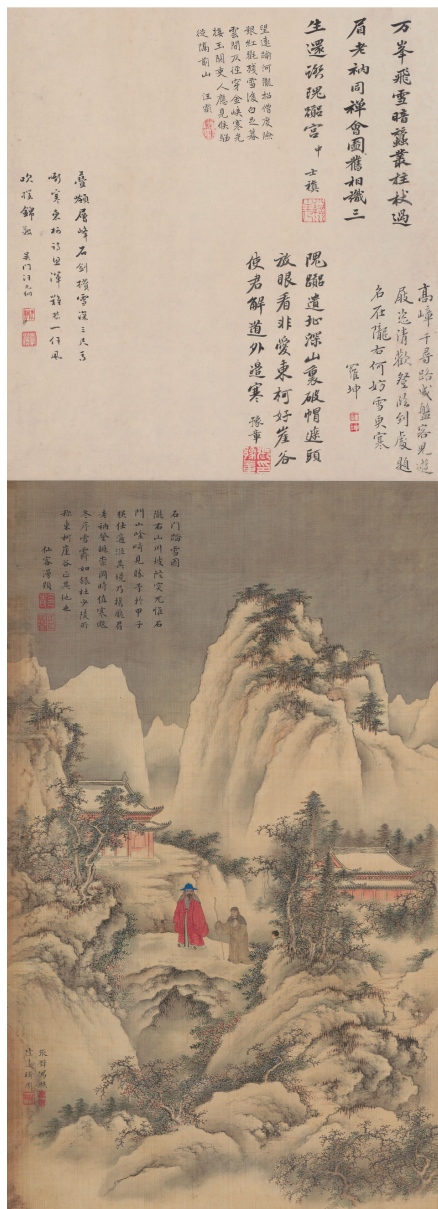


图12 《张璧写照陆远补图卞永誉石门踏雪景》轴

沈荃是华亭（今上海松江）人，康熙六年丁忧服满，授直隶通蓟道员，正于此年他书写了这段跋文，可能是出行或回京赴任路过也园而作。也园是明代布政使陆怀玉的园子，清延续其称，地点在今天的浙江省平湖市，属嘉兴市管辖。据张豫章等纂《御选宋金元明四朝诗·明诗姓名爵里》记载，陆怀玉字石含，万历己未（1619）进士，授工部主事，历郎中，出知镇江府，迁湖广按察副使，仕至福建右布政使。陆怀玉有《也园》诗：“种药云根已十年，小园独卧思悠然。岂无幽径通韦曲，亦有连山象辋川。半砌苔衣清似水，一池花石小于钱。归来便是西畴长，晚稻秋香满社田。”¹从诗中可窥其思想、向往和也园当时景象，但由于也园的记载鲜见，陆怀玉去世后园子情况已无从考证。沈荃当时对拓本的鉴定结论是“宋拓”，故而要“宝之宝之”。他最后使用的印是“臣荃印”，这种臣字印的使用，不只为君书画，这有实物证明。如故宫藏《郎世宁画果亲王允礼像》册，是果亲王允礼骑马肖像，有“郎世宁谨绘”款，钐印“臣郎世宁”“恭绘”²。这幅画是郎世宁奉雍正帝之命为允礼画的，可由其自己保存³。又如《张璧写照陆远补图卞永誉石门踏雪景》轴，是张璧和陆远为卞永誉合绘，画上方卞永誉自题一段，言康熙二十三年（1684）他四十岁时与庞眉老衲至石门山登睡崇冈时雪霁如银的景象。尾款为“仙客漫题”，并钐“令之氏”“臣永誉”印两方〔图12〕。这些书画都不是进献皇帝的，说明臣字印在使用上并没有严格的规定。沈荃在朝为官，对皇帝称臣，而此拓本绝非敬上之作。跋款有“漫书”字样，且有改动之字，也不似为旁人书写，或是自己留用之本。

通过以上梳理，可以看出这七种墨拓开始并不是一家收藏。通过题跋、钐印，可分析出是本前身的几段经历：前面“四表”为明代拓本，比后面三拓时间晚。除清宫钐印外，只有卞氏之印，这是曹溶曾经购藏之本。《曹娥碑》，明代钱塘人高濂曾藏⁴。清代吴廷伟、管世昌收藏过第一种《黄庭经》。第二种《黄庭经》沈荃曾藏，有“沈荃私印”并跋。沈跋“是拓纸墨黝古，丰采焕发”，后改为“是册纸墨黝古”，

1 （清）张豫章等奉敕纂选：《御选宋金元明四朝诗》明诗卷八十八，清康熙四十八年（1709）内府刻后印本。

2 允礼是康熙帝第十七子，画上有雍正十三年（1735）的自题：“我行西南，驰驱万里。蜀道即平，笮马孔驶。圣德广覃，天威尺咫。靡及有怀，瞻望无已。雍正乙卯六月果亲王自题”。《清史稿》记载：“果毅亲王允礼，……（雍正）十二年（1734），命赴泰宁，送达赖喇嘛还西藏，沿途巡阅诸省驻防及绿营兵。十三年，还京师……”画上自题“行西南”即言此行。（清）赵尔巽等撰：《清史稿》第三〇册，中华书局，1976年，第9083页。

3 参见聂崇正：《郎世宁的非“臣字款”画探究》，《故宫博物院院刊》，2002年第2期。

4 曹溶的《金石表》中也记录有《曹娥碑》和《黄庭经》，《曹娥碑》下还有“宋拓”的注释。但此本这两种墨拓上无曹溶印记，且题跋位置亦在“四表”后，因此不能断定其曾收藏。

从改动字看，是其亲笔。沈氏当时收藏即为一册，但册中共有几拓，不可得知。整本墨纸及题跋，每页皆钤有卞永誉“式古堂书画”印，证明这七种墨拓小楷，在卞永誉手中完整成册。拓本非皆宋拓，入清宫后鉴定为宋拓本，列入“上等”。

卞永誉（1645—1712）字令之，号仙客。隶汉军正白旗（一作镶红旗），历福建巡抚等，官至刑部侍郎。工画能书，是清代著名书画鉴藏家，著有《式古堂书画汇考》。他的著名藏品进入清宫的有五代董源的《潇湘图》、宋张即之的《汪氏报本庵记》等，亦被辑录进《石渠宝笈》。卞氏殁后，子孙不能守，散尽其藏，不少藏品归于安岐，最后进入清宫。此拓本无安岐印记，进宫详情不可考。

品相好是收藏的一个条件，“宋拓”《锺王楷帖》封面用黄色地银锭万字纹锦，此纹饰的织锦，现所见最多的是清中期制成的成品，如书画封面、锦盒等，至清晚期也还在使用，只是纹饰稍有变化。拓本锦面较旧，但确为宫中装裱。题签使用的是清乾隆时期仿宋藏经纸，此种带斑点的藏经纸，乾隆后期才得以生产。题签帖名楷书，无书者姓名。据封面、签纸材质，题签之字是在清宫装裱后题写的。

拓本有水渍、霉迹及虫蚀孔洞。此拓被水浸湿，是清宫收藏期间保存未善所致，夹于帖前附页鉴定品级的黄条有被淹痕迹，是其遇水的证据。《活计档》乾隆五十五年（1790）农历五月二十九日如意馆记录：“接得员外郎福庆押帖，内开：四月二十二日，懋勤殿交天水摹《张萱虢国夫人联辔图》一卷（换轴头）……以上十七卷上等。……《宋拓锺王楷帖》一册……《宋拓智永真草千字文》一册……以上十二册上等。《关九思山水》，十六开（重装，上等）。……传旨，交如意馆将上等十七卷配袱、别、匣，换轴头四对。册页十三册，配套、安白绫签，内一册重裱。……钦此。”¹在这段记载中就有“宋拓锺王楷帖”，当时是要如意馆做套，安白绫签，未提及重新装裱。这说明，是本于乾隆五十五年四月二十二日以前就已进行过鉴定，亦完成了装裱，后又做套、安签，但当年的帖套已不复存在。

三 《续编》著录中的问题

《初编》中没有收录碑帖拓本，从《续编》开始，拓本专作一类增入。以我们现在的认识，会发现《石渠宝笈》有错误、存在缺憾，特别是开始辑录拓本的《续编》，较后来的《三编》错误率高，其中有著录不准确、时代误判等问题，下面于此做探讨、阐释。

（一）著录不准确

《锺王楷帖》是《续编》著录文字与实物不完全相符的实例，其中包括页数不合、印文错录、鉴藏宝玺记载与实物不对应等问题。

页数记载与实物不合：《续编》著录“四表”是“六对幅”（本文以“开”称），实际拓本是八开。印文错录：“收传印记”中的“古杭瑞南高氏藏画记”，《续编》最后一字错记成“印”。“鉴藏宝玺”项与实物不对应：记

¹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合编：《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52册，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4页。

录为“七玺全，懋勤殿鉴定章”，实际拓本只有“七玺”之一的“乾隆御览之宝”和“懋勤殿鉴定章”。虽然《续编》拓本有“五玺全”“七玺全”“八玺全”的记录，而实际上《续编》拓本类未按钤印规则执行的情况很多，并不符实。通过文与物的对照，可以看出书籍编著者的意图和完成质量。虽然是本与著录文字有不同处，但确为当时那件被收录者无疑。

编纂《秘殿珠林》《石渠宝笈》是项大工程，每日大臣们抄录资料信息，侍奉人员抻叉书画，繁忙紧张。大臣胡敬（1769—1845）参加过纂辑《三编》，从《胡敬传》中可看到当时繁忙的工作景象：“胡敬……入直懋勤殿编纂《秘殿珠林》《石渠宝笈》三编。时溽暑，内侍捧轴仓卒辰视，敬衣冠端立，执笔录其文，记载尺寸印章，日至百十卷，无少懈。”¹大臣们一天要记录上百件书画，自有专人负责钤印及杂务，钤印或早或不晚于当场。编纂《续编》时的情景可以从阮元为沈初《西清笔记》撰写的序文中了解一二：早朝之后，大臣们在几榻上堆满数千卷轴的环境中工作，一直干到下午一两点钟方才结束。除此项工作外，同时还要在懋勤殿侍直并校勘太学正刊刻的《乾隆石经》²。在同一时间段中，编纂《续编》的十位大臣有八位参加了校勘《乾隆石经》，紧张的工作节奏和纷乱的环境，出现错误着实难免。而后期又不能逐一开卷校对，故此类问题的出现，是工作疏忽所致。

（二）时代误判

如前所述，“四表”曾归曹溶，他的鉴定结论是“旧拓”。而乾隆五十五年《活计档》做帖套的记录明确其为“上等”，系“宋拓”，这也是于宫廷已行鉴定的证明。分析当时误判作宋拓的原因：一是顾及皇上的喜好，将全册定为宋拓；二是大臣们鉴定拓本能力有限，误将整本皆定宋拓。

《秘殿珠林》《石渠宝笈》是清代宫廷收藏的大型艺术著录文献，这两书的初、续、三编参与人员不同。纂辑《续编》的大臣主要有十位，在搜检这些大臣的生平介绍、历官政绩之余，又从故宫度藏中找寻到部分相关文物，以便让我们对其擅长加深了解。

王杰（1725—1805），能诗文，擅书法，字迹工整清秀。从清宫遗存看，有他的楷书作品如《御制十全老人之宝说册》《御制戒得堂记》卷《御制热河文庙碑记册》等，还有行书《诗翰册》等书迹传世。从与他人书画合璧的成扇文物中可看出，他不仅擅馆阁体楷书，还临写了多位古代著名书家的作品。如与方琮合作完成的有临王羲之、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赵孟頫、董其昌等人书帖，在与徐扬合作的扇面上临写了《淳化阁帖》等。据记载，他八岁时即能书写匾额大字，一直勤奋习书不怠，正因对名家书法的勤学熟知，才具有了各体兼能的本领。

董诰（1740—1818），工诗文，精书法，擅绘画。董诰的书法深得乾隆帝赏识，是钦点的代笔人，在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快雪时晴帖》上，有乾隆帝这样一段文字：“予八十有三，不用眼镜。今岁诗字多，艰于细书，命董诰代写，亦佳话也。”当时董诰五十四岁。董诰不仅能书，更擅画，故宫博物院藏有他大量作品，装裱形式有轴、卷、册、贴落、成扇。奉敕书作有《御制元旦诗册》《御制养心殿记册》《临宋四家帖

1 （清）佚名撰：《清国史·胡敬传》，嘉业堂抄本。

2 （清）沈初：《西清笔记·阮序》，清光绪吴县潘氏刻功顺堂丛书本。

册》《书米芾西园雅集图记》卷等。画作山水、花卉最多，有《松菊凌霄图》轴《万山锦树图》卷等。《蟹鉴图》卷《文园狮子林图》卷《仁山静寿德水长清册》等皆为《石渠宝笈·三编》收录。故宫度藏的成扇文物中还有其画书兼作的《画梅花并临王献之帖》《画花卉并临米芾帖》等。亦有与人合作的，如《方琮画山水董诰书雨景诗成扇》《徐扬画玉泉山董诰临孙绰天台山赋成扇》等，其书楷、行、草兼备。

彭元瑞（1731—1803），精于古器物、书画鉴定，收藏图书颇丰。书法有《御制月令七十二候诗卷》《书弘历平定安南战图诗册》《书弘历寒山千尺雪诗册》，在《汪承霈、吴省兰等书画集锦横轴》上有他的节临《孙过庭书谱》。也有与人合作的《汪承霈画花卉彭元瑞书御制诗成扇》，有福长安画山水彭元瑞临名家书迹的成扇，临写了颜真卿尺牍、米芾帖跋、蔡襄诗帖、董其昌帖跋等等。有的书迹还刻成青玉版、制成墨等。

金士松（？—1800），书画皆工。故宫博物院藏品有《金士松书弘历万寿山五百罗汉堂记册》《花卉册》，有自己书写及与人合作的成扇，还有青玉镌刻的《御制五福五代堂记册》《御制重华宫记册》等。他擅长楷书，也临写名家书迹，有《临米友仁帖册》，在《汪承霈、吴省兰等书画集锦横轴》上，还有他临写的史游章草《急就章》。

沈初（1729—1799），以文学受知，擅书法。留存有《弘历含德斋诗册》《弘历题丁观鹏摹贯休十六应真像赞册》《临米芾尺牍册》等，还有《李秉德画荷花沈初书御制诗成扇》《谢遂画采菊沈初临苏轼尺牍成扇》等。

玉保（？—1798），工书法，评者曰出入吴兴堂奥。故宫存其书法作品有《御制文津阁诗册》《四阁记册》《临天冠山帖》《七言联》等。

瑚图礼，故宫藏有他的《书弘历作福作威论册》《书弘历匝衍记册》。有成组的楷书折扇，写《御制广陵涛疆域辨》《御制济水考》等，亦有行书书札。

吴省兰（？—1810），擅文，乾隆四十一年（1776）的《拟九姓土司箴四首序》《盛京恭谒祖陵礼成恭记有序·绎典篇》《寿恭集千字文五言律诗二十五首序》为其所作。御制诗文集亦见与王杰、董诰、沈初、彭元瑞、金士松、周兴岱、那彦成、阮元等共同“拜手稽首恭跋”。擅书，有《书弘历诗册》《躬稼抒丰》等，在汪承霈、吴省兰等书画集锦横轴上有他的节书《唐李程众星拱北辰赋》，还有与人合作的福长安画古木竹石图吴省兰书御制诗成扇等，其书法作品多为馆阁体。

阮元（1764—1849），博学淹通，能书画、天文、算学，政事文章。精训诂、考据学，经学深邃。其隶、楷、行、草四体皆能，故宫藏有他的《御制八征耄念之宝记册》《御制雪诗册》等书作。他写扇亦兼备各体，有《御制斗鹿赋》《御制夜亮木赋》《草书七古扇面》等。书札有《致里堂札》《致若膺札》等，对联除纸、绢本外，还有硬木包镶玉字的七言对联。

那彦成（1763—1833），工文翰，书法作品有《书弘历五经萃室记册》《书颉颃味甘书屋品茶诗贴落》《临董其昌帖》等，在汪承霈、吴省兰等书画集锦横轴上也有他的行书书作。《临赵孟頫兰亭跋册》等是著录于《三编》的作品。

据上述可知，纂辑《续编》的大臣，文翰佳绝，人人擅书，或能画，或擅长目录学及书画鉴定，但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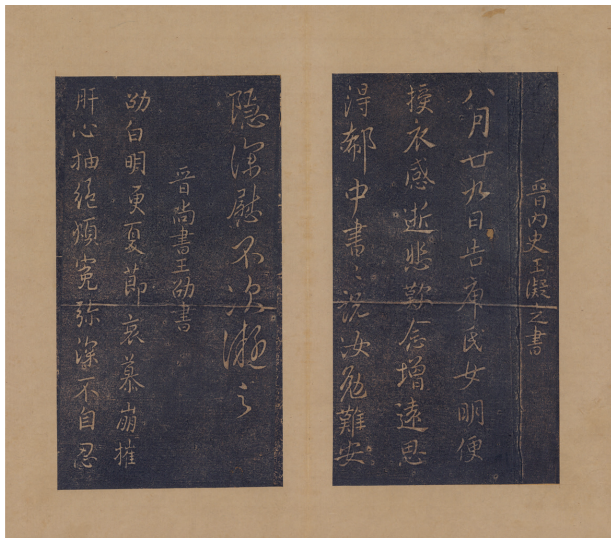


图13 清翻刻《淳化阁帖》



图14 翻刻“马蹄帖”（卷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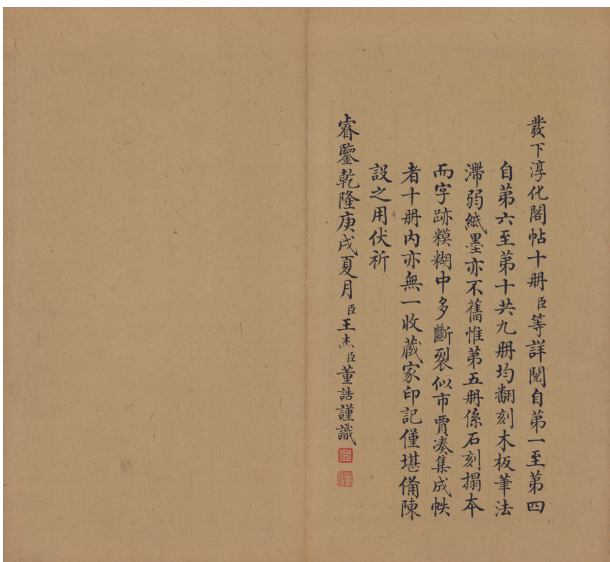


图15 清翻刻《淳化阁帖》王杰、董诰跋

数于碑帖版本并不熟悉。虽然阮元擅长金石考证，但他在参与《续编》时只有二十七岁，而日后督山东学政时通过与金石友人的交游，对金石学产生兴趣，遍访碑刻，搜集拓片，才完成了《山左金石志》《两浙金石志》等著作，自己的书学思想也逐渐成熟¹。他参加《续编》工作时年轻眼力好，识得古篆文，工作时有“绢纸黦黦印记不可辨者，诸前辈必就元指问”²，但在学识、经验等方面，王杰、董诰、彭元瑞等大臣的积累更加厚实，因此参加编纂工作时阮元不会起主导作用。

王杰、董诰等也并不熟悉拓本版本，这有实例证明。除了将明代翻刻《淳化阁帖》定为宋拓外³，

故宫藏有一套《淳化阁帖》亦可证明此论断，是帖织锦贴面，纸墨颜色甚怪。〔图13〕卷五墨色不同，遍布“冰裂纹”。〔图14〕帖后有王杰、董诰的跋文：“发下《淳化阁帖》十册，臣等详阅，自第一至第四，自第六至第十，共九册，均翻刻木板。笔法滞弱，纸墨亦不旧。惟第五册系石刻拓本，而字迹模糊，中多断裂，似市贾凑集成帙者。十册内亦无一收藏家印记，仅堪备陈设之用。伏祈睿鉴。乾隆庚戌夏月，臣王杰、臣董诰谨识。”〔图15〕这段跋文说明了几个问题：第一，这套《阁帖》是乾隆帝让臣子鉴定的，所以才有董诰等文辞谨严、极为恭敬的跋语。第二，从时间上看，此《阁帖》与上述为“宋拓”《锺王楷帖》等做套的时间契

1 尹一梅：《〈石渠宝笈·续编〉碑帖拓本的问题辨析——从四部“宋拓”〈淳化阁帖〉着眼》，《书法丛刊》2022年第3期。

2 （清）沈初：《西清笔记·阮序》，清光绪吴县潘氏刻功顺堂丛书本。

3 尹一梅：《〈石渠宝笈·续编〉碑帖拓本的问题辨析——从四部“宋拓”〈淳化阁帖〉着眼》，《书法丛刊》2022年第3期。

合，皆在乾隆五十五年农历五月，说明这段时间宫里进行过鉴定活动，应是为纂辑《续编》做准备。第三，董诰等依照板上的横向断裂，判断此帖除第五册外皆为木板刻，是帖肆商人拼凑本。第四，清宫陈设，可放置品级不高之本。据帖面上的号签，是帖曾置热河（承德）离宫。从跋文也可看出，大臣具备鉴别拓本的一般知识，知晓木板和石板损坏的区别，同时从书法看出帖为翻刻，纸墨不旧，但鉴定意见并未言至根本。此部帖刻工粗糙，缺帖、失行、短字现象比比皆是。粘裱错乱，有标目与内容不符张冠李戴的现象，或是将不同卷的内容混而装之。

经比勘鉴定，笔者以为：这是一套拼凑的翻刻《阁帖》，拓制时间在乾隆五十五年农历五月以前。其中的九册钩摹失准，笔法滞弱。缺帖、失行、短字现象甚多，或因依据的底本残损严重，或是双勾油条¹混乱丢失。多有横裂纹，但不符合木板裂痕自然规律，拓片上没有高低不等的感觉，系伪作木裂。出现于卷一的“隋文帝书”《双林寺慧则法师帖》，是将卷五原标“隋朝法帖”的内容，修改了标目裱入。乾隆三十四年（1769）宫中镌刻的《钦定重刻淳化阁帖》，即更改了标目移入卷一，但移动之帖注明了原居位置，是帖镌刻时间应晚于《钦定重刻淳化阁帖》。故宫另有与卷五同版之本，董诰等所得石刻结论正确，但未指明是翻刻泉州本系统的“马蹄帖”²。

四 结 语

辑录进《续编》的书画、拓本等，前期已进行过整理和鉴定，因此无论编辑书籍当场是否再行辨别，无论参与人员是否相同，实例证明大臣们确实不精于拓本鉴定。而工作的繁忙紧张，使之无暇细看深研，就连《锺王楷帖》刻印中的明显问题也未能发现，将锺繇的“四表”草草归为了宋拓。

综上所述，《续编》著录的“宋拓”《锺王楷帖》，实际上是明拓与宋拓的合装本。《石渠宝笈》一书著录了大量的艺术品，展示了当时丰富的清宫宝藏，这些珍贵的藏品，具有不可否认的历史、艺术和文物价值。当然随着实物资料的陆续公布，书籍记载中的错误与不足也会被逐渐发现，如鉴定误判、辑录失实、鉴藏宝玺使用不规范等诸多问题，这些皆有待我们识别判断、精心研究、去伪存真、纠正误识，乃至挖掘其产生的根本原因，还原历史真貌。

（作者单位：故宫博物院研究室）

1 古人刻石除直接在石上书丹外，要将字形移至石上，首先从墨迹底本上双勾纸样，纸样要附在石头上“钉朱”。将所用之纸涂上蜂蜡，以熨斗烤匀，纸变硬后如同经油浸过。这种纸呈透明状，能够较清晰地看到墨迹底本上的笔画，便于勾勒字形轮廓。为双勾和上石时方便，裁成条状，故名“油条”。将纸割小或裁成纸条，也有利于替换勾错及不满意之字，最大限度地保留勾写完美的字迹。

2 （清）吴肃公撰《街南文集》卷一九《跋》内记《泉本阁帖》：“泉本《阁帖》，皆坼裂作冰纹。相传鬻马厩，踉蹌所致，故世谓之‘马蹄帖’”。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吴承勋贞隐堂刻本，第13页。

